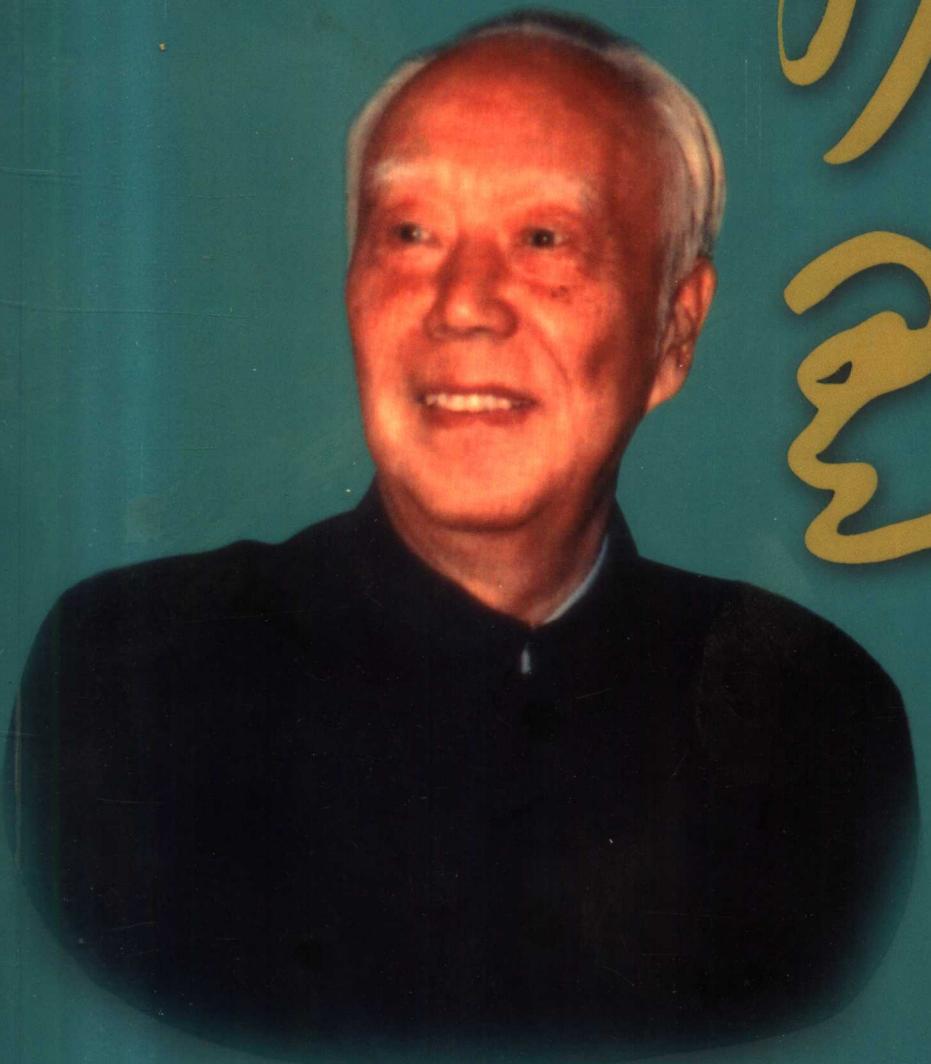


N

风云万里

风云 三苏



张广友 著

新华出版社

风云万里

风云

苏东坡

张广友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云万里/张广友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11 - 7822 - 3

I. 风… II. 张… III. 万里 - 生平事迹 - 1975 ~ 1985 IV. 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670 号

风云万里

作 者: 张广友

责任编辑: 刘 飞

封面设计: 伍民力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24. 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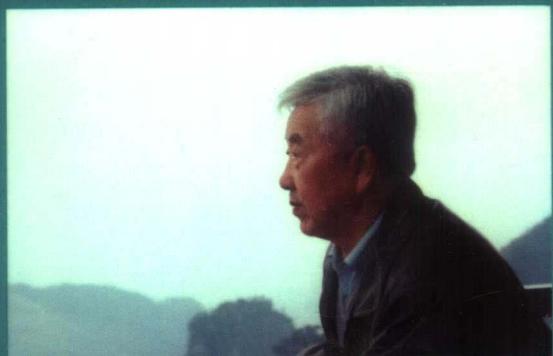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7822 - 3

定 价: 39. 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 89201322



张广友，中国名记者，1930年生，辽宁省铁岭县人。1950年初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进入新华社当记者，1982年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高级记者等。

在三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张广友实地采访了许多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唐山大地震、中越战事和中国改革，写下了一系列具有珍贵价值的内部和公开报道。

在半个世纪激烈动荡的政治风浪中，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张广友艰难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记者之路。他自言遵奉的信条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回首平生无憾事。

● 听有人说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说：我就不相信，他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

● 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万里感慨大发：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休想吃饱饭；针对农民吃饭问题，他说：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 陈永贵当上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领导人，主管8亿农民，这本身就是悲剧，无论对陈永贵还是对中国老百姓；然而，他高高在上时，却没多少人敢讲；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

● 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搞商品经济要有民主意识。改革的核心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有民主就有了积极性。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民主、实惠”。

序

万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蜚声海内外的领导者之一，是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中国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改革家。群众中广为传颂的“要吃米，找万里”，是对万里领导工作的高度评价。现在，万里虽然已经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品格，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依然铭刻在广大群众的心中。

出版一部记录万里改革实践的著作，是群众的殷切希望，但写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可喜的是本书作者张广友在这方面具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独特条件。

张广友原是新华社记者。1976年初，当“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峻时刻，他以记者身份被派往铁道部“蹲点”，与万里相识。在往后近20年的时间，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北京，他由于记者工作的方便，有幸继续同万里保持经常的接触，从而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许多一生难忘的事情。翻开作者一大摞采访本，其中记录着大量关于万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在内部会议上研究问题的讲话，同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谈话，还有和记者个人的交谈，以及为宣传所作的报道指示。这些发言、谈话、指示，许多内容极其精辟，只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写出来进行公开报道，有

些虽然写出来了，因万里不让宣传个人而被删节或未予发表。今天，过去不让报道的那些原因已经消失了，而这些资料并不因时过境迁失去其真理的光辉。它的价值不止是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万里，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受历史责任心的驱动，作者决心拿起笔来，把沉睡在采访本中的珍贵资料，系统地整理成书，以期使之变为广大读者共享的精神财富。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记录的不是万里在中国改革征途上的全部活动，而仅仅是其中若干重要片断。写作体裁上，既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人物传记。它的特点：不是万里写的万里，也不是作家写的万里，而是记者写的万里；不是今天写的昨天，而是昨天写的昨天。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历史的实录，改革的见证。它的可读性不在于优美的文学语言，深蕴的人生哲理，传奇性的名人轶事，而在于朴素的然而重要的客观史实。过去的 20 年，是我国国内发生伟大变革的 20 年。“四人帮”的覆灭，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华大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站在这个大潮前列的领导人，一位几经沉浮而矢志不渝为真理奋斗的领导人，一位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立下卓越功勋的领导人，他的思想轨迹，他的行为准则，他在坎坷路途上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时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所有这些都使史实本身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极大魅力。因此，完全可以相信，读者阅读这本书，会饶有兴趣；读了之后，会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育，得到奋发前进的力量。

华 章

1995 年 9 月 6 日

开篇语：逆境相识

穆青说：我就看中你了，几次你都没掉进去，说明你有经验了。万里说：上边的，下边的，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承担下来，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再乱了，别再翻烧饼了，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的波动不可避免，我最担心的是生产出问题。

1976年以前，我与万里本不相识。1976年2月中旬，“四人帮”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华社派我到铁道部“蹲点”。从那时起，我们才相识。

说起我去铁道部“蹲点”，颇有些戏剧性情节。当时，中央的宣传舆论大权控制在“四人帮”手中。2月中旬，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硝烟骤起的时候，姚文元突然指使新华社向铁道部、教育部、国防科委、科学院四个单位，各派两名记者“蹲点”，列席这些单位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会议，任务是通过内部报道，反映这几个单位的运动情况。当时的铁道部长是万里，教育部长是周荣鑫，国防科委主任是张爱萍，科学院的负责人是胡耀邦。一天上午，主管国内部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找我谈话，要我带领一名年轻记者去铁道部“蹲点”。那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是有看法的，对中央内部的斗争情况和政治动向是有所闻、有所见的。特别是我们这些搞内部报道的编辑、记者，接触到许多“机密”，知道的情况更多些，而且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又都心照不宣，遵守纪律，保守机密，谁都不讲。这次找到我头上了，不说不行了。

我对穆青说：“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去了。你难道没看出这明明是要搞这几个单位的领导人嘛，要咱们派记者去干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记者写《内参》，然后上头一批就打倒……”我对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法抵触情绪溢于言表。于是我说：“记者不是什么‘钦差大臣’，列席人家的党组会，像个‘特务’似的，那种滋味不好受……”穆青听了我的这些牢骚话没有吭气。他皱着眉头，深深地吸着烟。“他们都是部长，要撤，党中央、国务院下个命令就撤了呗，何必要我们去，反正我是想不通！”我接着说。

穆青听着我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心里的话也憋不住了，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想不通，我还想不通呢，跟谁说去？！”我很惊奇地反问：“啊！你也想不通？那好啦，咱们就别去了！”“不行，让咱们去，不去行吗？！这是中央的指示呀，我们怎能说不去呢？”穆青为难地说。

我说：“要去，你就派别人去吧，我这个人路线斗争觉悟太低，‘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挨过几次揪了，这你都是清楚的。1967年春天，社里派我去清华大学采访，清华红卫兵说我死保王光美。《井冈山》小报凭空捏造，骂我是‘狗记者’、‘小爬虫’、‘黑爪牙’，还抄了我的住处，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和采访材料，竟然不了了之，新华社军管小组还要我‘正确对待’。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明明是组织上派去的，是记者正常采访活动，可是却把我们这些记者当成‘五·一六’嫌疑分子审查，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五·一五点四’，差点成了‘五·一六’，是‘宽大政策’、‘四舍五入’把我给舍掉了。再说1973年10月，你和朱穆之派我去给‘十大’刚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军事博物馆当观察员。可是没想到，不久江青‘三五’讲话提出要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军事博物馆的一些造反派们，贴了我们那么多的大字报，几次来新华社揪我。所幸，李德生没有被打倒，否则，我不就掉进去了吗？”我说：“历次政治运动，记者总是处在风口浪头上，首当其冲，挨批斗，做检讨，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他们又多是由于工作，由于讲了真话。”我历数着每次运动中一些记者的不幸遭遇，越来越感到记者这碗饭实在难吃！

穆青不停地吸着烟，一声不吭，在默默沉思……

室内烟雾缭绕，一片寂静。

终于打破了沉静，我接着说：“我这 20 多年记者工作，一直是在你的领导下，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不管多么苦，多么累，多么危险，我从不讨价还价；可是，这种事儿我看去不得，如果实在要去，你就另找别人去吧！”穆青说：“我就看中你了，几次你都没掉进去，说明你有经验了……这次你去还是得去，不过你到那儿千万注意，不要随便表态，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什么话也不要说。一写稿子就是客观反映，张三说，李四说，不带任何主观见解……”

“像你这样写的，短时间还可以应付，时间一长，你写什么不写什么，本身就是你的态度，观点不暴露可能吗？一两次采访，写一篇稿子就走了，那还可以，要是去蹲上三五个月，以至半年，你试试看，除非你一句话不说，一篇稿子也不写，否则，不暴露才怪呢……”我满腹委屈、万般无奈地说。

最后，穆青半开玩笑地说：“没关系，你去吧，腰上别根大扁担，掉不进去，万一掉进去了，我去捞你！”

我深深为穆青这种对下级关心，勇于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很理解他的处境。记得 1974 年春天，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军事博物馆一些人几次来新华社揪我，是穆青等领导同志极力保护，我才没有被揪走，对此我十分感激！穆青一直是我的老领导，也是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者，他最理解记者，深知记者的苦衷。他爱护记者、同情记者，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于是我动情地对穆青说：“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先去试试看，不行我再想办法溜掉。”就这样我接受了任务。

万万没想到，时过不久，4 月中旬的一天，我回新华社看到大礼堂在开批斗大会，台上做检讨的竟是穆青。他同朱穆之、李琴三人因给毛主席写信告江青的所谓“告黑状事件”，被人揭发而身陷灾难。

会后，在楼道里我碰上了穆青，他还在牵挂着我的处境，问我：“怎么样？”我悄悄地贴着他的耳朵说：“您还说捞我呢，现在谁来捞您呀？”我深深地为他的处境而忧虑。

1975 年铁路整顿，轰动全国，大得人心。特别是我们这些记者经常外出采访乘坐火车，对此更有深刻体会。前几年，火车误点大家吃够

了苦头，有时一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来个小时，没吃没喝。铁路整顿后，火车正点了，大家都高兴，都很振奋。因此，对“四人帮”突然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整顿是“复辟”，人们普遍感到困惑不解。很多记者同事和朋友听说派我去铁道部，有的替我担心，有的劝我不要去，有的给我出点子，要我泡病号。

人生旅途中，在一些关键时刻，有时一句话，一个动作，以至一个情节，都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它像摄影时的一个重要镜头，一张重要照片，永远留在记忆之中，以至终生难忘。记得一次我骑车上班路过木樨地桥时，遇到了我在“五·七”干校的好友吴晋，他是国际部的一位老记者。我们停下车子，他拉着我站在马路边上，悄悄地问我：“听说你要去铁道部蹲点？”接着便非常激动地说：“跑到铁道部蹲的是什么‘点’？为什么偏偏要新华社派记者到铁道部、教育部这些单位去？要你们去干什么？去年铁路整顿有什么错？这不明明是要整人吗？！你是位大记者，可不要赶浪头，投某些人所好，要笔下留情啊！铁路‘安全正点’有什么不好的？人家把工作搞上去了，还要批人家、整人家，这是什么事儿呀！”我对吴晋说：“原来我是不想去的，穆青非要我去不可，我理解他的苦衷，现在想通了，与其让别人去，还不如我去。‘丈夫与世无所求，赤膊条任去留。’要我讲假话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可能的准备了！大不了撤了我的职，摘了我的记者牌子，那更好，不干就是了，省得再受这个罪，老婆孩子天天为我担心……”吴晋说：“没那么简单，这是政治斗争！闹不好，轻者是立场问题，做检讨，摘牌子，重者就是敌我问题，就是‘反革命’，坐牢，甚至是杀头，株连九族！不过你是有经验的老记者，小心点儿就是了！”

“内战”打了八年，人人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厌乱思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当毛主席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1975年的铁路整顿是顺乎民意，大得人心的，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因而，1976年，当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心情压抑，不可理解！真正的朋友，私下还能讲些真心话，提醒一下。他的这一席话，对我帮助实在很大。

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同新华社国内部一位年轻记者黄奉初，于2

月中旬怀着困惑、忧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铁道部，开始卷进了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当我们来到铁道部时，虽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已经逐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但铁道部依然比较平静，大字报寥寥无几，干部群众大都处在困惑不解、等待观望之中。

2月19日上午，在部长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万里。过去我曾经在会议上，在公开活动采访中见到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过。这次接触，一个初步的印象，是山东人那种直性子特点很明显，语言不多，似有所思。他同我们有个简短、但印象非同一般的谈话。他说：“听说你们来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内参’反映情况很及时，也比较客观，而且发送的面也比较宽，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及时看到。”“我们同意你们参加部核心小组会议，并为你们的采访活动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希望你们要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他在说到“深入”、“如实”四个字时，语气很重地重复了几次。接着他说：“现在正在按中央规定，逐级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有最近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兰州两个铁路局问题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这些材料你们可以先去看看。关于铁道部当前运动的具体情况可以找政治部了解，生产情况可以找值班室了解。”“你们对铁道部机关没接触过，先熟悉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们以后再交谈。”

一天晚上下班后，万里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间屋，同我个别交谈。开始，他问了问新华社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同朱穆之、穆青等新华社的领导都很熟悉……他说：“你们来了之后，我给朱穆之同志打了电话，他同意让你们列席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即党组）会议。”接着，他问起同我一起来的另一位记者黄奉初的情况。对此，我心领神会。我说，他是一名青年记者，“为人耿直，比较可靠，他对我是尊重的，我们是合得来的……”意思是请他放心。

经过一段寒暄之后，万里把话题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了。他充满困惑、忧郁地谈起了当前铁道部的一些情况。他说：“去年3月5日，中央发了个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我来到铁道部之后，主要工作是全力以赴地贯彻这个文件，一个局、一个局地解决问题。半年多的时间，铁路发生了深刻变化，秩序稳定了，堵塞疏通了，绝大部分路局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这一年

来，我大部分时间是到下边跑。去年 11 月 25 日，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把我从下边叫回来。现在铁道部的情况很复杂，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在谈到两个问题最大的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万里说最近由中央主持召开了两省（河南、甘肃）、两局（郑州、兰州）领导和铁道部领导参加的会议，搞了四个文件，根本没提 9 号文件，实际上是对去年贯彻执行中央 9 号文件、解决两局问题的否定。而且，在文件中点了两个局领导同志的名。我表示不同意见，我说要点就点我的名，否则我不签字。顶了一个星期，最后纪登奎副总理说：‘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的意见可以保留。’我才被迫签了字。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央 9 号文件和去年的整顿工作。”接着万里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是上边的、下边的、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承担下来，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再乱了，不要再翻烧饼了”。“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波动是不可避免了，我个人将会如何，这都无所谓，我最担心的是生产出问题……”

这就是我们与万里的初次见面。这也是我与万里相识的起点。从那以后，1977 年秋我跟他去了安徽，1980 年回到北京，我又在《农民日报》担任了 10 年总编辑，直到今天已经是近 20 年了。不知为什么，许多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薄，唯有这初次相识却铭刻在脑海里。也许，这是在多事之秋的初次相见，也许是因在逆境中相识的缘故吧！

目 录

序 (1)

开篇语：逆境相识 (1)

穆青说：我就看中你了，几次你都没掉进去，说明你有经验了。万里说：上边的，下边的，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承担下来，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再乱了，别再翻烧饼了，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的波动不可避免，我最担心的是生产出问题。

第一章 铁路整顿——中国改革的序幕 (1)

1. 邓小平东山再起 万里出任铁道部长 (3)

从解放战争时起，邓小平就器重万里，此后他一直跟着邓小平搞经济建设；在重庆时，两家住得很近，朝夕相处；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时，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万里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中，万里两次同下同上。

2. 全面整顿 铁路先行 (8)

邓小平把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选在铁路，万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任不到20天，邓小平两次召见；万里决心捅掉马蜂窝；中央下发著名的“9号文件”，

万里拿到了“尚方宝剑”。

3. 首战徐州告捷 (16)

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造反派当然不能放过；在武斗即起的关键时刻，万里赶来宣讲“9号文件”，批判派性，抓坏头头，平反冤案；仅仅10天，昏天黑地的徐州初见晴日。

4. 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 (24)

首战徐州告捷，万里回到北京，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作汇报。邓小平总结说：铁路上来了，现在要看各个部门的了。

5. 从南昌到长沙 (27)

整顿南昌局遇到了问题：地方派性介入铁路，部队的“通天大官”支持“P派”，铁道部管不着部队；邓小平发话：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

6. 推广铁路经验 以铁路促钢铁 (35)

邓小平作比喻：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他鼓励要建立一个强有力“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不要怕别人抓辫子。

7. 远征昆明 (38)

万里说：对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权不让；不管你是“八派”、“炮派”，都是资产阶级派性，都不允许搞了；谁再搞，我就给他戴上三顶帽子。

8. 全路工作会议与机关整顿 (42)

会上正式提出“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这一影响深远的著名的十六字口号。

9. 三下郑州 (46)

万里为新乡人民除了一霸，给郑州铁路局的派头头来了个釜底抽薪；紧接着撤了当时的郑州局党

委书记；“唐师傅”等人不服，串在一起向中央告状。

10. 兰州局整顿夭折 黎光被揪斗 (53)

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兰州局顿时大乱。

造反派围攻黎光，连王震副总理打电话也不放人。

第二章 在中国巨变前夜 (57)

11. 风云突变 形势逆转 (59)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邓小平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2. 郑、兰两局闹翻案 部机关刮起批邓风 (62)

华国锋任代总理；铁路运输生产形势恶化；中央指示铁道部“要与省委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华国锋批评万里拖延时间，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决定违心在文件上签字；刘建勋等“大获全胜”。

13. 千人上访 大闹铁道部 (68)

“批邓”指示下达之后，被万里整顿过的一些单位顿时大乱；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来访，冲击铁道部机关；万里用一个多星期时间出面说服动员，成效不大；兰州上访人员强驻部长办公室，连沙发扶手都刻上“打倒万里”。

14. 一篇内部报道 (74)

上访人员陆续来京，主要是铁道部领导，特别是万里同志去年积极地执行了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

15. 内外夹攻 处境艰难 (78)

万里被揪斗，记者解围；万里说：邓小平不倒则罢，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铁道部有人对上

访人员暗中支持，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

16. “批邓联万” 生产下降 (84)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达后，铁道部运动升温，大会套小会，批邓联万，整个铁道部“热火朝天”；造反派整出万里“三大罪状”，万里一概接受，“供认”不讳。

17. 邓小平下台 万里靠边 (90)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决议中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铁道部开始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

18. 简报事件 阴谋陷害 (94)

郭鲁等人背着万里向国务院领导人打小报告，不讲修改简报的背景和过程，歪曲事实，以至纪登奎和孙健等对万里进行了严厉批评，部领导小组开批判会。

19. 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所谓“黑关系” (98)

有人说：你和邓小平不是一般关系，这个问题要说清楚；万里说：邓小平这个人作风正派，从不搞阴谋活动。现在邓小平不倒则罢，倒了我拍胸脯也没用，搞不好会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20. 铁道部成了“四人帮”篡权的黑样板 (101)

万里在机关大会上检讨说：“邓小平 1975 年开展的全面整顿，我在铁路上都积极带头执行了。”面对阴谋陷害，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做违心检查呢？万里说：现在中央说错了，我得服从中央的，对中央决定，理解的不理解的都要执行。

21. 万里一倒 火车不跑 (106)

当时流行着许多顺口溜：“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

22. 万里复出 到了轻工 (110)